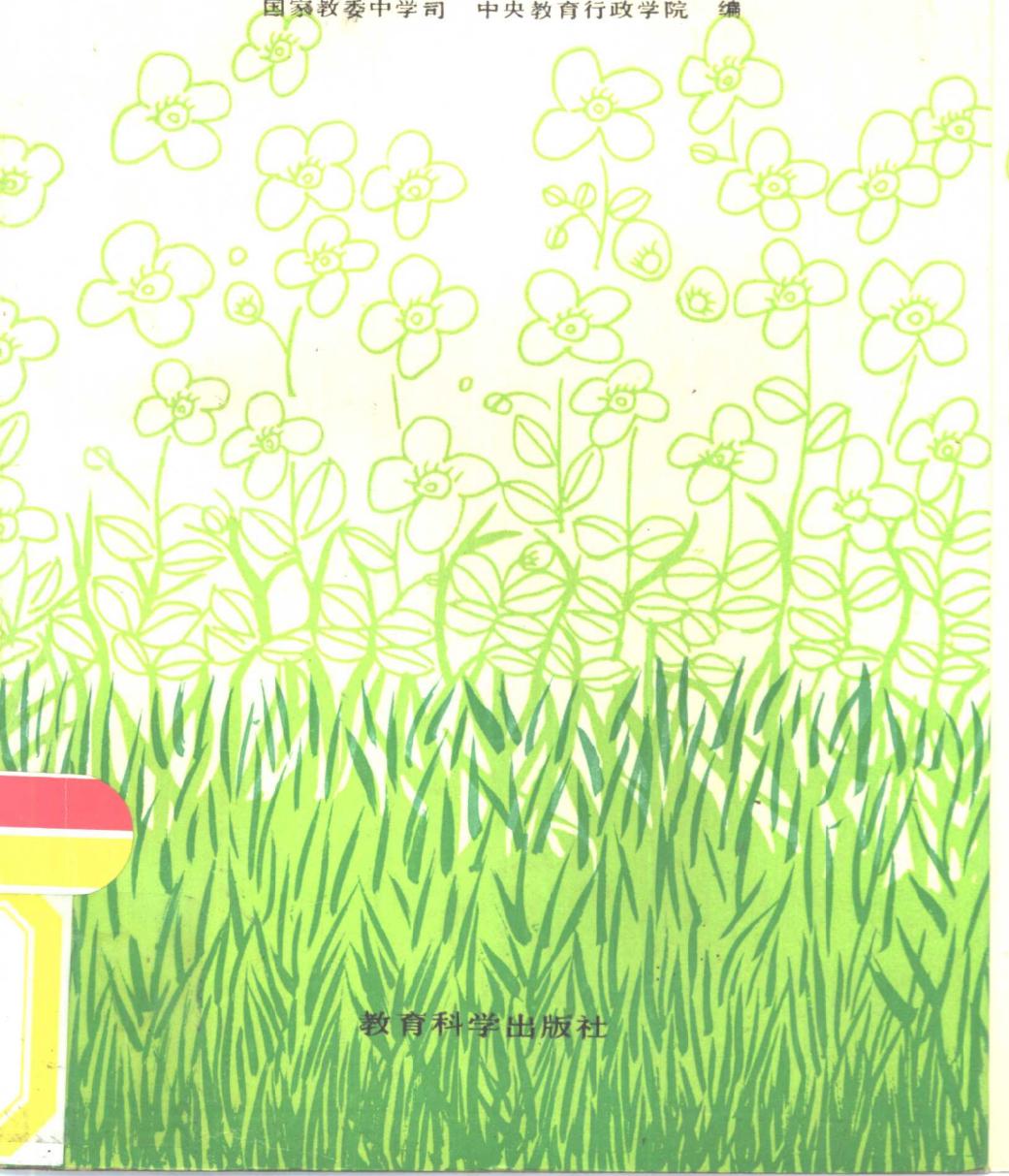


怎样办好中学教育

—— 教育思想研讨

国家教委中学司 中央教育行政学院 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怎样办好中学教育

教育思想研讨

国家教委中学司 编
中央教育行政学院

教育科学出版社

怎样办好中学教育——教育思想研讨

国家教委中学司 编

中央教育行政学院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太平庄·北环西路1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昌平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1/32开 印张：10 字数：245,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28,000册

ISBN 7-5041-0047-1/G · 041

(书号：7232·364) 定价：2.30元

编 者 的 话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把基础教育提到战略重点的位置，并作了法律上的规定。在党中央正确方针、政策的指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推动下，人们对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普通教育的办学条件也有所改善，广大教育工作者并创造出不少成功的办学经验，教育战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是，要根本扭转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改变我国教育事业的落后面貌，在改革教育体制的同时，还必须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而从教育思想上明确改革的方针要求，则是各项教育改革的核心。

为了进一步明确普通中学的办学指导思想，推动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国家教委责成中学司与中央教育行政学院于1986年冬举办普通中学教育思想研讨班，参加研讨班的有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九省、市的办学思想比较端正、教育改革有显著成绩的中学校长，省(市)地区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同志，共九十四人，研讨两个半月，参加研

讨活动的同志都认真总结了办学经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王明达、柳斌也先后到研讨班举行座谈，听取汇报，发表讲话，使研讨班取得了预期的成果。

这次研讨班以探讨教育思想为中心，就普通中学如何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如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如何面向全体学校，面向全体学生，提高民族素质，如何按照教育规律办学，如何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等问题，进行了研讨。研讨班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把学习理论、分析问题、交流经验，结合起来，在认识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共撰写出论文九十八篇。这些论文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又各有特色，对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体系，是很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把研讨班的研究成果编选成这本《怎样办好中学教育——教育思想研讨》，供广大教育工作者研究参考。参加本书编选工作的有张景莹、滕健、米桂山、何光荣、黄建伟、侯树根，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副院长李冀为本书写了后记。在选编工作中，由于集中在几个主要问题的论述上，有些很有分量的论文，未能收入；对有些有争论的问题，也都尊重作者意见，不强求一致，特此说明。

编 者

1987年4月

封面设计：张玉梅



I SBN7-5041-0047-1/G·041
(书号：7232·364) 定价：2.30元

目 录

编者的话	(1)
关于我国普教发展的几个方向性问题	
国家教委副主任 何东昌 (1)	
研讨教育思想，提高领导水平	
国家教委副主任 王明达 (16)	
关于基础教育发展的形势和任务	
国家教委副主任 柳斌 (27)	
我国普通中学教育改革的形势和特点	
国家教委中学司 卓晴君 (45)	
教育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相适应	
中央教育行政学院 李克纲 (61)	
要加强教育思想领导	
郭能雄 (73)	
关于教育思想若干问题的思考	
研讨班浙江组 (81)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刘建中 (95)	
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学教育改革	
研讨班江苏组 (104)	
加强学生成才培养	
研讨班天津组 (116)	
论升学竞争和片面追求升学率问题	
研讨班上海组 (128)	

- 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教育部门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研讨班湖南组 (142)
- 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综合治理” 袁金华 (158)
- 德、智、体、美、劳教育过程最优化初探 张大展 王天德 (167)
- 做好差生的转化工作 桂冠军 (184)
- 教育改革中要重视学生个性发展 研讨班北京组 (195)
- 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 沈阳市第一三四中学 (209)
- 端正教育思想，办好初中教育 汤锡忠 (227)
- 坚持改革，全面提高 北京市第七十九中学 (246)
- 农村初中教育改革探讨 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 (257)
- 中学教育与农村经济建设 朱乃涛 (271)
- 从重点中学的历史发展看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 李金初 (281)
- 发挥重点中学优势，积极开展教育科研 王楚松 (296)
- 后记 (305)

关于我国普教 发展的几个方向性问题

国家教委副主任 何东昌

建国以来，我国中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的过程：解放初期，中、小学学制是十二年，初中、高中各三年，当时的学制和课程设置主要是为了升学。以后是学习苏联，我们中、小学十二年的时间，装了苏联中、小学十年的内容，外语课一般都改成了俄语，取消了英语。现在看来，我们吃了亏，受了损失。1958年搞了教育革命，教育有所改革，但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后来，制定了《中学工作五十条》，进行了调整、提高，直到“文化大革命”。解放后，中学一直是重视德育的，以后又加上了劳动教育。当时中学生的思想政治面貌是好的，总的来讲质量是可以的，但有一个阶段质量有所下降。“文化大革命”对中、小学的破坏比较严重，“文革”后又逐步恢复起来。现在是在“文革”破坏比较严重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农村，农民富起来了，中学也增加了。这些历史值得总结，要用分析的态度来看待。有做得对的地方，也有做得不对的地方。总结经验，以便

使我们的中等教育有更好的发展。下面讲几个问题，请同志们考虑。

(一)

衡量我们教育成败得失的最根本的标准是什么？是以学校里分数的高低，升学人数的多少为标准呢？还是以别的什么为标准？

教育不是个主观的东西，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它一方面要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也要受社会实践的检验。教育的真正好坏，必须受到社会实践的检验。这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我们研究教育思想也好，研究教育的任何问题也好，不能离开这个根本观点。我们现在是按照一个共同的理想，建设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要起到自己的作用。教育的作用究竟怎样，要靠社会实践的结果来检验，即看我们培养出来的人究竟如何，思想道德素质如何，文化科学、身体素质如何，心理素质如何，适应不适应建设的需要。

现在学生中近视眼很严重。12月份教委召开了“全国7—22岁青少年体质调查”的总结讨论会。调查了90万人，每个年龄都分为男、女，城市、乡村这样四个组。结果是：身高增加了，体重、胸围和肺活量都不合标准，是“豆芽型”人才。过于肥胖的孩子只占百分之零点儿，正常的百分之二十多，大部分是营养不足。这是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怎样呢？现在我们讲德、智、体、美、劳，这几方面的素质都要受社会实践的检验，发现欠缺、不足的地方，要努力克服它。这是我们教育改革的出发点。不是因为外国有了什么，所以我们要改革，或者因为分数低了要提高它，才来搞改革。外国的东西可以给我们以启发，活跃我们的思

想，但不能以此作为出发点。素质的问题还要考虑到将来和世界交往的需要，考虑到二十一世纪的需要。因此，社会需要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很复杂，要预测到未来，预测到面向世界。但是基点还是面向今后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这样来检验我们教育的成败、得失，发现存在问题，就要找到根源加以改革。这就是我们教育改革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如果同志们同意这种看法的话，就会由此得出结论：教育厅局的同志、校长以及教师，特别是校长，要对自己的学生作追踪调查。这次研讨班曾到三所大学进行了追踪调查，了解本校毕业生在大学中的表现，有一定的价值。但这还不是最后的调查，因为他们还没有走上社会。另外，还有一大部分没有上大学的，没有包括在上面的调查范围之内。

离开调查研究，谈端正教育思想也罢，搞教育改革也罢，都难免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搞教育研究，都要提倡这一点。教育评价有许多办法，但最根本的是社会实践的检验，若离开这一条，那么这个评价只有相对的意义。绝对的标准是来自社会实践。好象工厂生产一台机器，最终要拿到生产过程中，即在使用过程中去考验它的好坏。经过这样的鉴定，以后才能说这种机器符合哪几条，出厂后在生产运行中是好的。就是说，工厂在制定产品质量检查标准时，要以生产实践的要求为依据。即使是这样，这个检验标准还只有相对的意义，最后的检验标准仍然是社会实践。当然，人不是机器，有主观能动性，但归根到底是从属于客观规律的。

关于遵循教育规律的问题，一个是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如何用教育规律培养他们，另一个是在教育规律指导下，制定出一定的标准，用以检验、预测这样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将来在社会上能

起多大多好的作用。我不知道有多少学校做过这样认真、系统、全面的追踪调查研究。教委中学司在修订九年义务教育的计划过程中做过一些调查。但我认为这个调查是不够系统的，当然做比不做强。

有句老话叫：“不能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们就常常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们中学、小学教育的总体效益是不高的，为什么？毛病就在于对教育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没有按社会实践的标准去衡量一下，没有切肤之痛。这个责任不在中学校长，也不在于教师，主要在我们领导部门指导不力。我们要提倡这个事情，要抓改革就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而且要科学地设计好调查方案，不能拿来一个结论，找几个例子来论证一下，这是很容易的，然而社会现象本身却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对教育后果进行综合的、系统的、抽样社会调查不够。我们要到使用人的单位去调查，不能只在学校里调查，这样做摸不着底。当然，在调查工作中，判断教育的后果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它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学生毕业后各种机遇不同，表现就会不一样。譬如所培养的素质相当的两个学生，毕业后一个机遇较好，一个机遇不好，那么表现出的后果就有所不同。调查就要排除这种因素，这是不容易的。一定数量的系统调查还是可以看出问题的。这是一门学问，可以形成教育学的一个分支——教育评价学。这是第一个要引出来的结论。第二个要引出来的结论是，教育不仅要面向全体学生、全面发展，而且每个教育工作者都要有一个思想，即对学生终身负责，这也是“面向未来”的具体化。若按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教育，还是存在问题的，有的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

(二)

根据什么来确定我们的教育思想？

从教育方针看，1957年、1958年时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教育为什么服务，当时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即教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功能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二是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1957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我们的培养目标。三是教育遵循什么途径来培养人，当时提的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么，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建议同志从这三个方面考虑一下。

关于第一个问题，《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我们的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里包括了为政治服务，但不仅仅限于为政治服务。《决定》公布后，这个问题从原则上讲是明确了，但是到具体落实就不一定那么明确。

第二个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同时还要适当地进行劳动技术教育。中学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要研究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因为教育是一种带有方向性的社会活动，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对他们施加影响是定向的，不是盲目的，这里有个朝什么方向引导的问题。

对于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现在仍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一个是，对社会需要大学培养哪些人才，存在一些片面认识，重理工，轻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思想较普遍。近几年情况有些变化，对管理和法律比较重视了，但是总的讲，还是认为报考理工科没有希望的学生才上文科。从日本的高等教育来看，理、工、农、医四科的人数占整个高等教育的29%左右，财经、政法、经济、文史哲等占71%左右。我们所存在的片面认识，不符合现代化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另一个是，对于社会需要的各层

次人才的合理结构，存在片面的认识。国家对大学以上层次的人才的需要相对来说还是少量的。美国至今二亿人口，每年大学本科毕业生不过100万；德国人认为进大学的人数最多占（学生总数的）20%就够了；日本的经济在发展，但大学的规模并没有变化，保持平衡状态。这并不是说我们的大学就够了，我们还是要发展大学的，但是大学生毕竟是人口的少数，中等层次的人才需要量大一些，但是需要量最大的还是工人和农民。

中国的产品要进入国际市场，必须有质量，原材料不错，加工不行还是不成。有的工厂成套生产设备都是进口的，图纸、工程师都是外国的，但是质量就不如外国的同类产品，原因就是劳动者的素质问题。质量是无法引进的。所以，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而最重要的是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素质，否则我们的企业上不去，农业上不去，国家也上不去，光有少数工程师、专家是不行的。《决定》中指出，一定要树立“行行光荣，行行出状元”的观念。这一点我们向教师讲得不够。

培养出来的人的素质低劣是教育上的很大浪费。只顾少数升学的学生，丢了大多数，加上教材的份量、难度不合理，脱离了大多数学生经过努力可以学好的实际，造成初中毕业生中很大一部分是所谓的“不合格”，即我们的某些规定不合理，高中生中占相当比例的学生“不合格”。这对这部分青少年是很大的打击，这个心理创伤是不好的。然后，这样一批人去当工人——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工人，他们对自己没有信心，是学校里“自暴自弃”的人，这对我们民族的素质是很大的损失。黑龙江省某县的调查材料中说，初中毕业生到农村，德、智、体都不行，体力上顶不了八小时的劳动，没有实用知识，品德方面也有毛病，组织纪律观念差。由此可见，丢掉大多数的最大损失是严重影响我们民族的素质。我们要让所有的师生都懂得，搞社会主义建设究竟

需要什么样的人，各级各类人才应该怎样合理构成。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具体化，要落到实处。不要把对学生的文化方面的要求看得太严重，搞得太紧张，中国人爱学习，很用功，这是我们的长处、优势，但是压过了头就会走向反面。片面追求升学率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脱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效益非常低。另外，违背全面发展的方针，单纯追求智育，其后果之一是有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进了大学后不再用功。当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缺乏理想和动力，大学毕业后工资待遇低等等。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学阶段把学生的学习兴趣搞掉了，学习成了苦差使，只是由于受到各种压力才去过“独木桥”，缺乏内在的兴趣。另外，大学有些课程的教学方法不太有吸引力，教材内容也有些问题，这也是原因之一。毛泽东同志强调使受教育者得到生动活泼的主动的发展。现在把主动权、主动权从学生的手中拿走了，什么创造性也谈不上，这就从根本上脱离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针。

第三个问题，通过什么途径来培养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里都提过。他们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社会的一个杠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早期结合是必要的。我们是在1958年正式提出了这个口号，曾出现过一些偏差，就是劳动过多了。1964年，毛泽东同志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没有再强调这个问题，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主课，这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来的。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了新的解释。广义地讲，教育要和社会主义建设配合起来，同时学生要适当地参加劳动。中小学生参加什么劳动，大学生参加什么劳动，花多少时间，怎么同教学密切结合，都要有恰当的安排。邓小平同志前两年又提出了教育的“三个面向”的问

题，对通过什么途径来培养人，也给我们指出了方向。

通过什么途径使教育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普通中学要向职业中学学习。一些很差的中学，一旦改成职业中学，教的是社会所需要的东西，办得很是认真，师生的精神面貌很快就变过来了。因为学生感觉到尽管上不了大学，但是毕业后自己是社会上所需要的人。职业中学是把教育与社会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了，所以，职业中学的风气常常比普通中学好一些。现在的教育严重脱离实际。大学里也存在这个问题，现在的大学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书生意气，指点江山，但是实际的东西懂得很少。小学生是“四、二、一”综合症，中学生是“重点保护”对象，到了大学又是关起门来读书，对社会实际情况不了解，却自视很高，大事做不了，小事不愿干。所以最近提出了：大学生要参加社会实践，普通中学要加一点劳动技术课程，让学生们知道做一件事情不容易，知道社会上的需要，有一个踏踏实实的思想作风。究竟中学生毕业后应具有什么样的素质？现在我们提德才兼备，不提又红又专。因为中学生不是“专”的问题，也不只是“红”的问题，提德才兼备比较科学。

胡耀邦同志提出的年轻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问题，这是中央集体定的，是对的，要坚持。教育和社会实践相联系不一定都是和生产性劳动相结合，对生产劳动的概念要理解得宽一些，形式是多样的，包括第三产业在内，还得有个地方让学生去干干。

(三)

教育怎样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这是个理论问题。这方面我们的经验还少，要研究一下外国的教育与商品经济的联系，但不能照搬。因为思想意识是与经济

基础有关的，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包括所有制、流通过程、分配，是一个完整的概念。我们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商品经济，公有制就要求与公有制相应的思想意识，如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思想。这都是公有制所派生的。所以不能够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的竞争观念搬过来。直接与商品经济有关的是让学生不要轻视第三产业，这一条很重要。

“文革”以前及“文革”初期，在大城市里都觉得当八大“员”是非常不光彩的，这就与商品经济发展不相符合。美国人口里，直接从事第一产业——农业的人口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几，第二产业——工业人口也只占百分之十几，而百分之七十几的人口是从事第三产业。要发展商品经济，就要重视第三产业。

另外，要使学生们树立起集体主义观念。这与商品经济并不矛盾，无论做什么事情，光靠一个人是不行的，而是需要来自各方面的多数人的协作。我们的改革，无非是把社会生产搞活，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我们要使学生有一个开朗的性格，不怕失败的性格，使他们敢于开拓，善于同别人合作。学习上总是有好差之分，同学之间，对学习差点的学生要给予帮助。学习不能搞竞争，这是多年经验所证明了的。解放初期搞过互助小组，学习竞赛，结果是失败，没有成功的经验。但不怕困难，不怕挫折、勇于进取的性格还是要的，珍惜时间、守信用等品德应该培养。还要注意从小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民主与法制是相辅相成的、对立统一的。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不是社会主义法制，反之亦然。学校里还要加强纪律教育。尊师是对的，但老师与学生之间是否能进行讨论，真理面前师生是否平等，老师鼓励不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提问题，甚至提老师不会的问题，师生之间人格上是否平等，这是问题的另一面。学生要尊重老师，老师要爱护学生，老师不要侮辱学生，要尊重学生的人格，这才有利于培养